

SERIES STUDIE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 汪熙 主编

中美特殊 关系的 形成

—— 1914 年前的美国与中国

〔美〕韩 德 著



本书对 1914 年以前中美关系的发展状况作了全面回顾。书中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深入地分析了早期中美关系，对两国关系史提出了新的说明与解释。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汪 熙 主编



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

——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

〔~~美~~〕韩 德，著

项立岭 译

林勇军

张自谦 校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邬红伟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第10辑)

汪 熙 主编

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

——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

〔美〕韩 德 著 项立岭 林勇军 译 张自谋 校

出 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权路579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7.375

字 数 442 000

版 次 1993年10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801—5 800

书 号 ISBN7-309-01074-4/D·78

定 价 21.5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 1914 年以前中美关系的发展状况作了全面回顾。全书分为三编，共八章。第一编论述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形成以及当时中国政府采取的态度；第二编论述早期中美关系的状况以及两国关系格局的形成；第三编讨论本世纪初两国关系的发展，及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书中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深入地分析了早期中美关系，对两国关系史提出了新的说明与解释。

丛书主编前言

我们想到翻译韩德 (Michael H.Hunt) 教授这本书并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 是因为韩德作为一位美国学者在论述中美关系时, 不但没有完全落入丹涅特和格里斯沃德的窠臼,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跳出了费正清的框框。这些美国前辈学者的著作常常是美国历史学家在论述东亚或中美关系时奉为经典的。韩德教授破成说, 立己见, 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中美之间的所谓“特殊关系”, 其说由来已久。它是美国人引以为自豪, 而又常常是某些中国人寄予幻想的。在很长一段时期中 (甚至一直到现在), “特殊关系”的内容往往是美国对华政策“无私”、“善行”和“保护中国”的同义词。在这种“特殊关系”的覆盖下, 美国的政治家和政策决策者, 认为他们有理由对中国忿激、诅咒, 说一些难听的话, 甚至动武。据说这好像是家长对不成材子弟的一种忿恨。影响所及, 美国学术界把中美关系塑造成“又恨又爱” (ambivalence) 的模式。所有这些, 根子都在对“特殊关系”的理解。韩德教授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对这种“特殊关系”作了比较冷静、客观的分析。他认为过去人们如此这般地理解“特殊关系”是历史的误解。一方既不必以“恩人”自居, 另一方也不必对这种关系寄以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很尖锐地把 19 世纪美国排外主义者虐待华工的活动, 与义和团运动时中国人打击传教士的活动进行对比。应该说, 当时在美华人受到美国排外主义的攻击、凌辱和虐杀, 其令人震惊的程度并不低于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遭遇, 有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美国, 其结果是制定了彻底禁绝华

人的移民律，而在中国却是丧权赔款的辛丑条约。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特殊关系”？作者把历史引向令人思索的更深层次。

韩德教授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把意识形态（包括文化与价值观等）因素引进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分析，从而也引进了中美的“特殊关系”之中。美国人自建国起就认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及民主制度是人类进步的楷模，而且认为以美国的模式来改造其他国家是美国人的职责。这种意念是如此强烈，甚至不惜以激烈的手段把美国模式强加给对手国。这样，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成为“拯救”与“统治”融为一体的产物。韩德教授在本书结束时，意味深长地指出，美国不应把自己设想的一套，越出国界，强加于别的国家，应该承认美国这样做而想达到的效果是有限度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总结。一直到今天读起来仍令人有新鲜感。

韩德教授在论述中美关系时，着重分析了两国间文化的差异与相互撞击，这是很有特色的。但也使我想起，文化的差异固然在中美“特殊关系”中激起了波澜，但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当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冲击时，意识形态的因素会退居次位。譬如，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引起了美国的强烈憎恨，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根本差异的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也受到美国的冷遇与歧视。这是为什么呢？美国不是宣扬自由与民主吗？意识形态的力量到哪里去了？依我看来，秘密在于孙中山的民族独立，特别是废除列强不平等条约的纲领，触犯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在旧中国，条约权利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石，是美国国家利益之所在。不管在意识形态领域孙中山与美国是多么接近，但是他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纲领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于是孙中山寄希望于美国支持的幻想破灭了。意识形态的因素显得苍白无力。美国宁愿“拯救”袁世凯而撇弃孙中山。

中美关系的历史是够复杂的。很多中外学者都尝试着对它进行说明与解释。韩德教授是一位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的这本书和另外一本专著都是获奖之著^①。我们赞赏他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中所拓展的新思路。我们虽然并不完全同意韩德所说的一切方面，但是他毕竟提出了一些可供思索的问题。当然，对他的论点你也许赞同或部分赞同；你也许反对或部分反对。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交流，才能看出一致和差异。有比较、有鉴别，再加上独立思考，才能使我们的学术繁荣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汪 熙

于复旦校园

1992年4月

^① 除这一本书以外，韩德教授另一本获奖著作是《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中 文 版 序

本书主要论述的是美中两国门户开放关系的起源。许多人，也许是大部分中国读者，会立即把门户开放与 1899 年和 1900 年海约翰国务卿的外交照会相联系，与美国需要反对其他列强的侵略行动以保护其在华经济利益相联系。本书提出了关于门户开放的另一种更为广阔的见解，并试图展示这一政策的复杂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人和中国人自 18 世纪开始接触直至本世纪最初几十年这段期间的相互作用。本书中有四个要点我希望中国读者会感兴趣，甚或受到触动。现逐点加以简要说明。

第一，美国门户开放思想之萌发，不主要是，而且肯定不完全是出于经济原因。门户开放作为一种政策，既未经明确阐述，也未得到大力推行。若把门户开放视为三个不同利益集团——谋取利润的实业家，渴望提高国威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致力于中国精神与文化之改造的传教士——联合的创造物，就能最好地解释这些特点。在这三个利益集团中，有理由认为传教士是影响最大的。举例来说，他们是决策者、外交官和公众有关中国情况的最原始的来源。他们作为遗产留下的是美国人心目中的某些历久不衰的中国形象。这三个集团在 19 世纪 90 年代结成联盟协同行动，力促华盛顿为美国在华利益采取有力行动。随着美西战争以美国的胜利宣告结束，有争议的和平条约在参议院通过，美国对新属地的统治立足已稳，海约翰和威廉·麦金莱总统可以转而处理这三个利益集团不断提请决策者们注意的中国危机。

这些利益集团用以劝说华盛顿支持门户开放政策的论点并非

突然从天而降，他们关于中国的性质和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的论点在 19 世纪中业已形成。这些论点出自美国人所持的关于统治和拯救其他民族的一系列广泛的概念和设想（甚或是幻想）（本书第 317 页），并因此而具有了意识形态色彩。无论这些利益集团的根本目标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共同信念，就是使中国保持门户开放，以便美国人可以扩展他们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和影响。这些美国人坚持认为，在自由竞争中，他们的基督教慈善动机，他们的经济知识、技术和资本，以及他们有吸引力的民主制度，使他们享有明显优势。美国人梦想使中国在美国的庇护下实现独立和“现代化”，这一梦想激发了“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人期望中国人会因感谢这种帮助而对美国友好，这种期望又使“门户开放”政策得以维持下去。

门户开放政策一经形成，便证明是一项涵义极不明确的政策。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原先政策的倡导者是从不同利益考虑的，海约翰和麦金莱在宣布门户开放时，看来首先考虑的是推进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提高美国的威望。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为中国文化复兴的需要可由美国传教士改革者予以满足，而将门户开放政策服从于首先同强盛的日本搞好关系。他的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特总统恢复了海约翰和麦金莱的门户开放政策和他们对市场的关心。但塔夫特政府的意图也是要利用门户开放来增强美国在华的外交影响。这一意图，有时推进其经济目标，有时却又与其经济目标相冲突。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又给门户开放政策以新的理解，他把增进美国文化影响的愿望置于塔夫特提出的经济计划之上。

若说这四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断然拒绝冒险，拒绝投入大量的国家资财来促进它们在华野心的实现。在这些年间，门户开放政策多半是梦幻，而中国仍不是美国官员们认真关注的对象。当时美国决策者关注的是加勒比、中

美洲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欧洲。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这种情况一直未变。不错，正如某些人所说的，门户开放时代的早期标志着美国帝国主义开始染指中国。但是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在美国人实际取得的文化和经济优势上，华盛顿的功劳（或过错）也是有限的。

第二，在门户开放政策中，中国方面的情况很重要，这一点往往被忽略。早在 1899—1900 年以前，中国的地方官员就试图将美国关于对门户开放的支持中美友好的词藻，变为中国的某种实际利益。直至清朝覆灭之后，他们一直对此怀抱希望。这种希望以两种方式出现。他们对中美战略合作感兴趣，因为这可能制约其他列强，并打破已建立的势力范围（例如在毗邻的朝鲜，在东北和华中）。他们还对美国能提供教育、技术和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感兴趣。主张与美国建立联系者，把美国视为列强中最不具侵略性的国家，最宜于驾驭来实现中国政策目标的国家。

当然，那些试图利用门户开放和利用美国人的晚清官员常常受到批评，他们通常被说成是卖国贼，说他们受自己阶级利益和腐败的清政府所驱使，一次次向帝国主义的要求投降，但是这一指控可能并不完全公正。如果换一种角度看，这些官员也可被认为是努力保卫中国漫长边界和主权以及筹划经济发展战略的爱国者。因为在当时情况下，他们自己既无资财，又无法从京城得到足够的支持，诸如李鸿章、徐世昌等官员就是这样，他们在绝望中为疆防和谋求富强转向美国求援，可是与美国合作实际证明是很困难的，他们的主动积极性很不够。美国人的目标同中国官员心目中的愿望常常背道而驰。更糟的是，那些曾经是由美国方面的大胆声明和冒险计划所引起的，也是由中国方面一厢情愿发展而成的对美国的期望，却总也得不到满足，因为美国的活动很少有符合中国所期望者，因而中国对门户开放的希望屡次变为失

望。美国是否真与其他列强不同？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和对其他列强的妒忌，是一种软弱的反映还是一种仁慈的表现？这些大可怀疑的问题，在对华政策的辩论中一再提出。

门户开放历史的第三个值得重视的特点，是 19 世纪后半叶漂洋过海到美国西部去的 50 万华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处境。正当美国政府准备采取行动正式支持中国门户开放时，华人移民所面对的却是更为严峻的门户关闭政策，当美国人有权在中国不受清政府监督和管制而自由、安全地行动时，在美国的华人却发现自己受到干扰、限制以至被驱逐。19 世纪最后 30 余年中，由于美国本地人反对华人，促使国会和各州当局通过了形形色色的排华措施。美国总统和清朝官员都一度抵制过这种歧视政策和作法，但最终还是徒劳的。

1900 年的事件，使中国的门户开放和美国的门户关闭这种颇具讽刺意味的对照更为强烈。这些事件也揭示了太平洋西岸仇外势力的力量。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在美国是排华气焰甚嚣尘上，在中国是频繁袭击外国人（其中美国传教士也不在少数），最后导致义和团运动和美国参加八国联军派兵到中国。这些情况提醒人们——如果还有必要提醒的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并不是一贯友好的（不管两国官方的辞令如何宣扬与此相反的神话），虽然两国高级官员都在努力缓和其同胞的普遍愤怒和保护外国侨民，但是他们受到两种文化所产生的社会动乱和政治骚动的冲击而身不由己。

第四点，也就是最后一点，值得说明一下的是门户开放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更好的角度认识当代的中美关系。1979 年，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要求中国的历史学家对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进行评价时，他们是充分认识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这种联系的。在以后的学术讨论中也涉及到（有时是小心翼翼地）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美中关系和今天重新接近的美中关系，例

如门户开放对中国有利还是不利？美国是否可以信任？如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对于这些问题，根据本书可以作出以下回答：在美中之间的大门再次开启的 15 年来，旧的门户开放政策至少有两个基本特征又重新出现。

首先，美国人在想到中国时，按美国的形象改造中国之梦仍然存在。诚然，理查德·尼克松政府是把战略考虑提到首位的，他的继任者继续根据这些战略考虑制定政策，但是在大众新闻媒介、官方声明和决策者的回忆录中，仍有证据表明，感情用事的见解仍然对美国的想法产生微妙而又重大的影响。例如，来源于传教士的有关中国的形象和吉米·卡特一起进入了白宫，而罗德·里根则继续了这一趋向，从美国文化价值观的胜利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今天，许多美国人本能地支持输出美国式的民主。

在中国方面，与旧的门户开放时代的决裂也远非彻底。毫无疑问，中国革命改变了它外交政策的风格并巩固了它外交政策的基础，现在中国之门应开多大，对谁开放等问题的决定，再不是由外国人作出，而是由中国人作出了。但是中国仍有一条漫长和易受攻击的边界，这使北京面临着人们所熟悉的战略问题；中国还是个穷国，有强烈的发展要求。因此毫不奇怪，当今中国人对门户开放关系所抱的希望似乎不过是在老调门基础上的一些变化而已。在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美国主动提供了对抗苏联的战略保证。近期以来，美国的重要性在于，它能通过贸易、资本投资、技术转让和教育方面的交流而有助于中国“富强”。

中美双方领导人能否协调他们的不同目的？在目前新门户开放政策体制中，一种较为平等的关系使北京处于较强的谈判地位。使华盛顿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听取北京的意见。现在总的看来，这将有助于减少长期以来官方关系中所特有的那种大幅度的摇摆，并增加了建立互利关系的可能性。但是新门户开放政策的筹划者如何处理有争议的诸如台湾、西藏、人权、贸易和武器出

售等问题，只有时间才能作出回答。

借此结束之际，我要感谢支持本书翻译的以丁名楠教授为主编的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感谢项立岭、张自谋教授和林勇军先生为翻译此书所作的努力，感谢约我为此书中文版撰写新序的陶文钊先生，最后我还要感谢外交学院的熊志勇先生给了我一次演讲机会，本序言即以这次演讲稿为基础。再有，汪熙教授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其能作为复旦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丛书之一出版，陈锡鏢、邬红伟先生在本书的付梓出版中也倾注了劳动。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我诚挚地希望此译本将能提醒太平洋西岸的读者，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美良好关系是自然而然的事，正如我希望英文版本已经提醒了太平洋东岸的读者那样。历史在帮助我们理解反复出现的问题方面，在促进相互的更好谅解，并因此改善友好关系的前景方面有它的作用。我希望由于更多的读者可以阅读此书会多少有助于这些目标的实现。

韩德 (Michael H. Hunt)

1991年9月21日

序 言

每本书都有其作者概况可供叙述，本书是在我的教学生涯开始时撰写的。当时我专心要为耶鲁大学一批对美国 and 东亚关系感兴趣的一年级特别生提出以历史观点来观察美国在 20 世纪中期卷入亚洲纠纷的方法。导致珍珠港事件的历程、中国的陷落，朝鲜战争和台湾海峡的周期性危机——凡此种种都萦绕在我心中。但是，最使教师和学生全神贯注的则是当时正在进行的那场代价巨大和制造分裂的印度支那战争。

我最初出于本能，着手研究论述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文献，以便找出当代危机的历史根源。后来我发现，上述文献的主要内容和我所关心的问题毫不相干，使我大失所望。这是促使本书问世的最初动力。泰勒·丹涅特的《美国人在东亚》（1922 年版）一书，是我的进行研究的合理的起点，它集中地体现了这个问题。它的主题广阔，阐述严密，因而使它具有经久不衰的巨大影响。虽然现时很少有人阅读丹涅特的著作，但是他所提出的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概念，历史学家们在它问世后将近五十年来一直予以借鉴并作为依据。但是，正是这种概念使我感到它已过时，而且狭隘和片面，因此需要修正。丹涅特撰写本书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告结束。他试图论证，美国需要和其他大国合作，以便形成一种稳定、和平的亚洲秩序。《美国人在东亚》一书论述一个过去时代的争端。而且，它强调美国的外交和重要政策，却忽视了非官方的接触，实际上没有以亚洲的观点来看问题。^[1]

文献方面的缺陷不久使我相信，我必须探索自己的道路。由

于我个人的兴趣和所受的特殊训练，我对中美关系这个课题有所偏爱。它似乎自然而然地成为我的出发点。虽然采取一个将日本、朝鲜和中国都包括在内的更庞大的结构也许是弥补文献缺陷的理想方法，但我已准备确定一个较小的目标，即深入探讨中美关系的双方；而把重新联结东亚国际关系的线索这项工作，留给其他历史学家去做。新问题、新资料和日益增多的专题文献，为我放弃丹涅特和其他人的值得称赞的泛太平洋观点，提供了理由。

设计这个方案的最后倒数第二个步骤，是减少我重视现在的倾向，以便我想要重新创造的世界将会被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所认识。在这方面，我发现，将加勒特·马丁利的训谕当作座右铭是很有裨益的：“对于已经去世的人们来说，是否能获得后代公正的对待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对于活着的人们来说，给予公正的对待，不论曾延误多久，却是至关重要的。”^[2]印度支那战争令人欣慰地告终以及它逐渐转变为仅仅是“历史”，这些都有助于缓和促使我首先着手这个计划的某些令人迫切关心的问题，同时我希望由此也使我能在这本书中对所论述的事件和人物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

最后，我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论述结构。这个结构要从一开始就能适合我所关注的问题，即使过去说明现在，而又不粗暴地破坏过去的完整性。本书的主题体现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特殊关系”的起源。就“特殊关系”一词长期的习惯含意而言，它强调了美国人扮演的仁慈角色，中国人的感激，以及中美接触中的相互善意。我自己对“特殊关系”的概念截然不同。如后面大量章节论证以及后记所表明的，19世纪大量不同类型的中国人和美国人——从横渡太平洋的无名的旅行者到著名的社会人士——在文化、经济和外交方面互相作用的过程，到20世纪初期，已将两个文化和地理相隔甚远的国家，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广泛的、复杂

的和不稳定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我在本书中探讨了这个时代形成的特征，以及 20 世纪中叶在亚洲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与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中国之间产生冲突和疏远时，这种特殊关系所起的作用。只要这种探讨能达到使读者满意的程度，则我将在很大的程度上答复最初促使我撰写本书时所关心的问题。

读者可以按三编的顺序，依次慢慢地阅读本书。每一编和 18 世纪末期到 20 世纪初期中美关系发展的各个重要时期相对应，并以一个历史性故事作为开端，引出在紧接着的各章节中将要论述的重大问题。或者，读者可以由这一章跳到另一章，按论题来阅读本书。第一、五和第八章论述“门户开放支持集团”（这是我为一批利益集团——美国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定的简称），他们共同致力于对中国的渗透，并在美国国内传播一种旨在保卫和改造中国的家长政治的幻想（照惯例与门户开放相关）。上述这些章节也把美国利益集团与那些支持它们和反对它们的中国人联系起来。在第一章的前半部、第四章和第六章中，以整军备战的中国人一方的孤注一掷的行动与另一方美国人的日益提高的要求作为显著特点的上层政策获得了应有的结果。中国移民所遭受的苦难，美国排外主义情绪日益增长的力量，以及中国官吏所采取的防御性保护政策，在第二章后半部、第三章、第七章中均有论述，并且从主题上与美国成功地向中国渗透相呼应。

这里不妨说一下我的研究战略。我的初步计划是主要从中国这方面收集原始资料，而从美国方面收集经过较好研究的第二手资料，以构成双边关系的历史。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未能实行。虽然我费力地阅读了范围很广的中国文件，但我很高兴地从其他人的学术研究中获得许多帮助。许多研究工作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完成的。相反，当我阅读美国这方面的文献时，我一再地不禁要追溯原始资料，阐述我认为重要的但却被人忽视的论点，检

验有争论的或有疑点的历史概括，或者仅仅要更好地掌握有关的人物与时代。其结果是，这本历史书在某些问题上完全是基于独创性的研究，在其他问题上则大量地依靠权威的专题著作。有时则是两者兼有。这样，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既不是惯常的研究专著，又不是引伸出来的概述，而是一个混合物，一个“研究概述”。我希望研究美国与东亚关系、美国对外关系和近代中国史的历史学家们，能在本书中发现充分的新材料和新观点，以补偿阅读本书时付出的艰苦努力。同时，我试图将本序言作为一篇完整的和易于理解的引言，提供给那些不熟悉中美关系的读者们。

我扼要地解释一下本书史料的处理：为了节约起见，对经常引用的文件集，在书后注释部分的前面提供了经过缩写并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文件表，每章注释前，我补充了一篇有关历史文献的短文，这些短文表明了我从其他历史学家们那里受益匪浅，同时也表明了我 and 他们的某些不同观点。这些短文的目的是，也在于要为那些希望更深入地进行研究的人们提供指南。除非另有说明，在这些叙述中，传记性资料是摘自标准的参考资料。^[3]为了缩短已嫌冗长的注释，我在所引的书目中删去了出版者的名字。

我本人所欠的情谊，远远超过十年前我着手写作本书时所能想象的情况。我尤其感谢约翰·布卢姆、多萝西·博格、谢尔曼·科克伦、沃伦·科恩、沃尔多·海因里希斯、汤姆·希特拉、简·亨特，入江昭和霍华德·拉马尔等人，他们对本书的各种不同草稿作了批评性的评论。我的姻亲保罗和特丽萨·施赖特为使这项学术工作能更令人愉快地进行，曾几次提供了舒适安静的场所。《商业史评论》慷慨地允许我在本书中重新使用该刊第51卷（1977年秋）中的材料，题为“19世纪90年代到1931年美国人在中国市场：经济机会和经济民族主义。”我也非常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允许我从《疆防和门户开放》（1973年版）一书中